

农民工创业的注意事项

1. 农民工创业的主要情况

创业即自己开创事业，是在充分考虑自身条件、经过缜密的市场调查和准备后，开办小商店、小工厂、小服务部等的过程。

从农民工创业的形式来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返乡创业；其二，在城市中创业。从投资创业的性质来看，投资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情况都有。从投资规模看，投资规模也有大有小，从几千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2. 我们是哪种创业类型

(1) 打工转型的创业

这类创业者可称之为“四带”，即带回技术、管理经验、市场客户和订单，有的还带回熟练工人，因而创业成功率相对较高。

(2) 最容易的创业类型，依托于基本生活所需的创业

这类创业表现为家庭小工厂、小作坊、小卖店、小餐馆之类，对资金、技术和管理的要求不高。

(3) 依靠政策，实行产业带动型的创业

就是利用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积极投入相关产业中进行创业。如有的地方提倡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部分农民工返乡创办了休闲山庄、观光农业、园艺基地等，吸引城市居民到农村体验农村生活和观光旅游。

(4) “能人”+“返乡创业互助组”的创业

创业者均是在外地有着效益不错的企业，回乡创业是为了带动家乡的群众一起致富。创业者也可以利用当地较为便宜的劳动力和熟悉的文化人文环境获得更大收益。

3. 创业需要关注当地政策

(1) 创业场地的政策

一些地方文件明确规定引导和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通过租赁、承包等合法方式利用闲置土地、闲置厂房、镇村边角地、农村撤并的中小学校舍、荒山、荒滩等场地进行创业。允许通过村庄整治等方式盘活集体建设用地存量，将置换出来的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减半收取集体非农用地规费。例如，安徽省为满足农民工对创业场地的需求，在产业集聚、返乡较多的乡镇建立农民工创业园。

(2) 税收优惠政策

很多省份出台的文件对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都安排了税收优惠和返还，对返乡创业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的，相关部门适当提高营业税的起征点。

(3) 金融扶持政策

不少地方，对于返乡创业的抵押品和抵押物做出了相关规定，返乡创业农民工证照齐全的房屋产权、机器设备、大件耐用消费品和有价证券以及注册商标、发明专利等无形资产均可作为抵(质)押品，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这就扩大了抵押范围，有利于创业者获得金融融资。还有不少城市探索用土地流转经营权、商品林权、农房、农业生产用房等作为抵押担保方式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贷款。

(4) 就业再就业政策

包括：通过税收减免，鼓励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招用农村就业困难对象(农村建卡贫困户、农村低保人员、农村残疾人、农村零转移就业家庭成员等)或城镇就业困难对象；通过重点企业贷款贴息，鼓励招用农村富余劳动力或城镇下岗失业人员；通过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将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纳入就业专项资金小额担保贷款支持范围；通过享受培训补贴，将参加创业培训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就业再就业培训补贴范围，享受免费创业培训；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招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纳入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培训计划，按“阳光工程”培训标准补助等。

节选自中国工人出版社《农民工应掌握的110个创业常识》



福建宁德：

多措推进农民工进城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福建省宁德市日前出台《关于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政策实施方案》，从教育、医保、社保、就业等7个方面提出具体的财政政策措施，推动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

为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支持力度，市级财政部门在安排就业专项资金时充分考虑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问题，将常住劳动年龄人口数作为分配因素，并赋予适当权重。县级财政部门要统筹上级转移支付和自有财力，支持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中的失业人员进行登记，将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纳入就业困难群体对象办理就业创业证，并享受职业指导、介绍、培训及技能鉴定等公共就业服务和扶持政策。

《方案》明确规定支持进城务工人员购买安置房，通过推广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增强城市承载力，支持进城务工人员购买中心市区的安置房，对符合补贴对象的进城务工人员，给予购房补贴。

为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各县(市、区)政府要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统一城乡各阶段学生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等教育惠民政策。

此外，还将通过创新、完善城乡基本医保制度、社保体系，加快实行一体化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支持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实施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业转移进城就业人口可纳入城镇企业(灵活就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保障体系，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

低矮工种不愿干，高端工种干不了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低位徘徊”

把频繁换工作当成“试错”和增加技术、阅历、收入的路径

本报记者 杨学义

4月7日，李畅抹完最后一桶灰，跟随一同而来的几名师傅返回北京市房山区的住处。忙碌了一天，他不禁感慨：“我今年30岁了还没有稳定工作，发愁。”机修工、橱柜安装工、泥瓦工，李畅在最近4年的时间里已经从事了三份工作，“每一个工种都知道一些，但都是给人打打下手。”李畅对《工人日报》记者说，当一份工作干了一年半载之后，便会感受到其中的发展瓶颈，从而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李畅的情况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并不鲜见。低端工种不愿干，高端工种干不了，是他们面临的突出问题。

求职盲目、技能缺乏

李畅是河北省涿州市人，经常随工友来北京揽活儿。作为一名泥瓦工，他已经上手一年多了，从搬运、搅拌石灰开始做起，干了半年之后开始上手铺砖、抹灰。不过，他的速度很慢，铺的砖也有很多坑洼洼的地方，师傅们总要给他“扫尾”，因此，很多时候还是在帮师傅们打杂。

相比之下，和李畅在一个团队的刘爽虽然只有27岁，但铺砖的质量和速度都要比李畅好得多。李畅告诉记者：“刘爽的爸爸就是我的一个泥

瓦匠师父，对自己的儿子，人家肯定毫不保留。”不过，刘爽却告诉记者，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已经做了将近6年的泥瓦工，“早年练习砌砖的时候，我爸让我在冬天不停地拿砖块练习铺砖角度和力度，而且还会要求速度。”久而久之，他的双手变得粗糙不堪，还有几道被瓷砖划破留下的伤疤。

李畅承认，自己“并不踏实”，每当一份工作在一年左右遇到瓶颈时，便会“知难而退”。多年下来，他所接触的工种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拿出得出手的一技之长。

记者采访到北京市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招聘主管吴先生，他坦言有技能的农民工在用人单位很抢手，甚至到了紧缺的程度，但从目前应聘情况来看，大多数农民工求职盲目、技能缺乏，这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尤为突出。

“短工化”与技术工难寻

与李畅相似，90后农民工王丽丽在北京做过化妆品销售、餐厅服务员、美容美发。她在家乡安徽的一家技校毕业之后本来有机会到服装厂成为一名女工，因担心车间劳动强度大而放弃。由于缺乏耐心和韧性，并且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因此她频繁“跳槽”。她坦言，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进入服装厂，“最起码可以掌握一门技术，现在的工作完全没有技术含量。”

记者了解到，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将频繁换工作当成“试错”，还将这当成增加技术和阅历、提高收入的路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报告》显示，农民工“短工化”趋势随着年龄减小而增强，而且“短工化”趋势正在逐年递增，有超过60%的农民工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值得注意的是，更换工作后，虽然有42%的农民工薪酬有所提高，但仅有11%的人在技术等级方面有所提高，15%的人在薪酬、技能和发展前景方面均无提高。

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高薪难觅技术工人的情况也屡见报端。比如，东莞市一家公司为熟练技工开出了5000元至8000元的高薪，仍然没有招到合适人选，只能招聘普通工再逐步培养成技工；河北省一家制造企业招聘10名焊工和钣金工，但由于该岗位既要能电焊操作，又要会看图纸，最后仅5人报名。

超六成未接受技能培训

国家统计局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这意味着仍然有超过六成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另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机会接受一次职业技能培训或岗前培训。对生产一线岗位、符合省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参加职业培训且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根据培训成本，省财政厅还会分别按照不超过1500元/人、3000元/人、4000元/人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

王丽丽对此颇有感触，她表示尽管工作后日

渐认识到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但从来没有一家用人单位为她提供过培训。她认为，这与上班时间冲突有一定的关系，“我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美容院，由于工作性质就是从早干到晚，所以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安排培训。”

李畅则认为之所以培训困难，就是因为培训内容和工作实操错位，导致培训作用不大，“比如泥瓦工，根本没有理论培训的必要，一切都应该在工作时言传身教”。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培训费用过高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比例较低的重要原因。以泥瓦工培训为例，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一家培训机构收费达4500元，这对初学乍到的学徒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有调查显示，19.9%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培训费用过高，44%的人只参加有组织的免费培训。

对此，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做出努力。江苏省办公厅近日出台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2017~2020年)》就提出，到2020年，江苏省将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补贴类职业技能培训45万人，力争使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机会接受一次职业技能培训或岗前培训。对生产一线岗位、符合省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参加职业培训且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根据培训成本，省财政厅还会分别按照不超过1500元/人、3000元/人、4000元/人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

顾自身发展的需求，更应肩负社会责任，重视员工的技能培训和提升，并将企业文化融入职业技能培训，从追求眼前利益转向追求长远利益。让农民工学习职业技能和了解企业文化犹如鸟之双翼。在“机器换人”背景下，企业应针对农民工的特点，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工作，让农民工在技术路上可以越走越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敬业精神和忠诚度，为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支撑。

此外，用工城市也应保护企业在农民工技术培训方面的热情，分担投入成本，增强企业开展技术培训的积极性。同时，辅以设立各类社会化培训学校，让农民工可以自由选择，打开职业技术学校和企业之间的通道。让有学习意愿和能力的农民工能够享受城市教育，在不断学习中成长提高。

在传统制造业中，机器只是作为帮助人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而存在，而现代制造业“机器换人”却直接把机器变成劳动力。在这种制造业竞逐“机器换人”技术红利的逼迫下，农民工作为制造业的主力军和中低端劳动力的主体，无疑成为“机器换人”中最受冲击的群体。因此，农民工更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尽快登上当前这列技能培训的“高速列车”，努力提高自己的软硬技能。

登上技能提升的“高速列车”

赵剑影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特别提出要实现我国推进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全覆盖。这无疑是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能力不足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目前，在我国劳动大军中，进城务工人员占据了极大比例。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这部分人群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只有三分之一。这造成了就业市场上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因为缺乏技能，农民工就业难；另一方面，企业急需有技能的工人，却年年遭遇招工难题。

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这种产

业转型升级对农民工就业带来的影响会逐渐加深。我国已经进入工业4.0时代，新产业、新业态在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对求职者的技能提出了要求。无技能要求的岗位越来越少，需要有一定专业技术知识的岗位越来越多。没有技能的农民工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生存。

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拥有强大的“蓝领”队伍。当下，要解决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势在必行。提升我国劳动力质量，让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更多谋生技能，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不仅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为各地提供经济转型发展动力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针对这个问题，我国已经陆续出台一些政策。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的《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在有学历提升需求且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中，国家将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使他们能得到相应的技术技能培训，提升自身素质与从业能力。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也提出要在三年内消除无技能就业的现象，加大技术补贴力度。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企业和个人更要看到机会，抓住机遇。一些企业面对技能培训，只看到收益，舍不得投入，认为在培训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了成本，万一员工跳槽了怎么办。殊不知，正是这样的短视行为，导致对农民工的技术投入不足，从而使企业人才乏力，出现农民工“技能荒”的窘况。

企业的目的自然是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但也应当看到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会用人、能留人是企业提高收益的关键。企业不仅要兼

北京：“蜘蛛人”清洗鸟巢迎“五一”

4月11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工人正在对鸟巢外壁的钢梁进行清洗，将以整洁的容貌迎接“五一”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到来。

金闻 摄/视觉中国



收徒首看品德心性，拜师前三年学做人

“先德高后艺高”的徽菜大师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实习生 马慧君

接到安徽省总工会要为自己的工作室颁发“劳模创新工作室”牌匾的消息，尹亲林特意把在合肥的十几个徒弟叫过来一起享受这一幸福时刻。

尹亲林在合肥创立了“亲林徽菜研发工作室”和“安徽省现代徽菜文化研究院”，早在2005年即获得“中国徽菜大师”称号，而他更响亮的名头则是世界厨师联合会仅有的两名中国国际评委之一。

“学一门技艺，首先是要修炼品德和心性。”从一个农民工一步一步成长为“徽菜大师”，尹亲林对“先德高后艺高”有着切身的体会和认识。

“先把手艺学精”

尹亲林初中毕业后，家里无力供他继续上学。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当厨师的大伯便给他提建议：学做菜，干厨师这一行。1991年，年仅17岁的尹亲林踏上了前往马钢招待所的学徒之路。

一向老实勤快的尹亲林到了那里脏活累活都揽下来，有时候别人都下班了他还在打扫卫生。由于表现优异，他被推荐到马钢驻北京办事处做学徒。

在北京，尹亲林兢兢业业地做着该做的事情。时间久了，同行高额的薪水让他非常向往。“我家穷，我要挣钱给家里补贴，可那时我一个月只能领到180多元，在外面干的同行们能领五六百元。”

为王义均大师的座下弟子。

“我刚认识王老师的前三年中，师父都在教我怎么做人，他说资质再高如果人品差的话宁可不收。”尹亲林说，师父告诉他，他不能收下一个对行业、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徒弟。三年过后，师父王义均才真正开始教尹亲林做菜。

“中国菜的根在民间”

在恩师的鼓励之下，尹亲林走上了回乡振兴徽菜的新路途。

在漫长的走访之路中，尹亲林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与他渊源颇深的“百岁老人”方良根。方老告诉他“中国菜的根在民间”。这句话他时时刻刻铭记于心，愈加感到弘扬徽菜离不开民间技艺。

除了传承民间技艺，尹亲林还将重点放在创新上。他认为现代徽菜不应只是狭义的特指徽州地区的皖南菜式，而应当是包括皖中、皖北整个安徽地区的“大徽菜”。

“要想做好‘大徽菜’，不光要靠民间的工艺，

还要融合西餐文化元素，结合市场需要推出适合现代人享用的健康、美味又营养的现代徽菜。菜谱的融合就是文化和口味的融合，中西合璧、合理搭配才能登大雅之堂。”尹亲林说。

经过十年磨练，尹亲林推出了“臭鳜鱼”、“李鸿章养生烩”等新式经典徽菜，还将鲁菜与徽菜融合形成徽商官府菜，设计出“太白宴”、“香菇宴”、“周瑜宴”等极富中国传统内涵的高级菜肴。因此，他多次获得“中国徽菜大师”、“中国烹饪大师”的称号，赢得过国内、国际多个烹饪大赛的金奖。

2016年，尹亲林在安徽合肥成立了中国首家民间组织餐饮研究院“安徽现代徽菜文化研究院”，领衔、主导并致力于在全国及国际上传播徽菜文化。同时，他积极开展“名师带高徒”活动，培养了全国各地的50名优秀厨师，让传统徽菜后继有人。

劳动光荣·劳动圆梦
追梦·我的奋斗